

范式的转型：政治科学研究与学术期刊的使命

包刚升

前面诸位学者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这里先做一个点评，随后再讨论我要讲的主题。探讨中国的学术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一个必要的提醒是：理解学术要有正确的时空感。作为学者，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学术的引领者。作为国家，每个国家都想做学术的引领者。但问题是我们能够引领吗？

如果对美国经济崛起和引领全球科学与学术的过程做一简要回顾，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按照经济史学者的看法，美国的经济总量 1870 年左右就已经接近英国了，之后又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成为经济总量的全球第一。^①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可以说是全球史中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但无论是 1870 年还是 1900 年，美国的科学与学术仍然显著地落后于欧洲。^②在衡量科学成就方面，诺贝尔科学奖是一个重要指标。截至 1939 年，美国仅有 13 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德国为 34 人，英国为 22 人。1939 年以后，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数量才慢慢赶上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直至完成对欧洲的超越。同样有意思的是，美国在二战之前就如同今日中国一样崇尚“海归博士”。当然，这里是指欧洲的海归博士。1939 年前后，美国前 20 所著名大学约有半数校长是来自欧洲的海归毕业生。这也说明，即便到了 1939 年——此时美国经济总量跻身全球数一数二的位置已有 70 年之久，美国在科学与学术上仍然甘于做欧洲的“好学生”。

简单地说，美国的这一历史进程有三个特点：第一，美国从经济总量全球第一到成为全球领导型的科学与学术大国，大致用了 70 年或更久的时间；第二，美国在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一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欧洲科学与学术的虚心模仿者和学习者；第三，考虑到美国的语言和文化与此前的全球霸主英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美国就是英国在北美新大陆的衍生国，所以，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科学与学术上超越此前领导者的难度可能被低估了。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官方语言不是英文，那么它成为全球领导型科学与学术大国的时间估计还会更长。

那么，美国的故事给我们何种启示呢？首先，经济上的总量崛起不等于科学与学术的崛起，从经济总量崛起到科学与学术崛起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次，如果在科学与学术上尚未成为全球领先国家之时就放弃模仿和学习而急于创新，未必是一种好的策略——当然，模仿与创新之间并不互斥；最后，理解科学与学术要有正确的时空感，这才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务实、从容地对待中国的学术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问题。

接下来，我主要讲一个题目——“范式的转型：政治科学研究与学术期刊的使命”。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变革，简而言之就是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型。^③

中国的社会科学是 1978 年之后逐步地恢复和重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作为 3 个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经历了总体相似但节奏不同的发展历程。大致来说，经济学在这 3 个学科中是最为领先的，学术规范程度和与国际接轨程度也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 25 年前，打开当时国内主流的经济学期刊，以今天经济学家和一流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阅读偏好来衡量，这些论文的研究范式无疑是陈旧的。1992 年，中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此后经济学迎来了发展与繁荣的春天。1994 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立，或许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学新旧范式的转换速度加快了。从一流大学经济学教师的学术训练背景，到普通高校的经济课程设

① 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1870 年美国 GDP 是 98.37 亿国际元，英国 GDP 是 100.18 亿国际元，两者差距已经不到 2%，而美国的经济增速略高于英国。同期法国 GDP 为 72.10 亿国际元，德国 GDP 为 71.43 亿国际元。美国经济总量超过法、德 36%—38%。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78 页。

② 关于美国与欧洲科学成就的历史比较，参见菲利普·比斯坎：《欧洲科学帝国的衰落——如何阻止下滑？》，邱举良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年。

③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六、十四章专门讨论了科学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0—47、156—188 页。

到学术期刊——特别是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一流学术期刊——评审标准和论文水准的提高，到整个经济学界研究议题与方法的变迁，再到公共领域经济学话语系统的转换，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研究已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完成了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型。中国经济学研究今天所达到的繁荣程度，跟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型是分不开的。

在我看来，经济学的过去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政治学的未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型已初现端倪。这一趋势性的判断主要基于三个理由。第一，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代表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发生研究范式的转型，而这种转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政治学。宽泛地说，社会科学诸学科是很难彻底分开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都是社会现象，只是各自的核心议题不同，不同学科实际上还互相渗透。比如，国内已经有经济学家和教育学者在美国一流的政治学期刊上刊发学术论文，而这些论文的主题都跟政治学有关。所以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型，势必会带动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第二，20年前中国政治学界的海归学者数量还很少，今天各一流大学均已出现相当比例的海归学者。不少优秀的海归学者已成为正教授、院系领导、长江学者、学科项目评审专家、论文评审专家和基础课程讲授者。这些学者从教学到科研再到人才培养，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着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此同时，很多优秀的非海归学者同样掌握了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并产生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通过科研还是通过教学，他们同样成为了政治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推动者。

第三，目前国内不少一流大学已经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中开设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少数高校已经开设从初级定性、定量研究到高级定性、定量研究的完整研究方法课程。^①研究方法课程的更新，也推动着一流大学在读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学习和掌握新的研究范式与学术规范，其影响更为深远。

当然，上述三个理由更多地是基于学术“供给侧”的考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需求侧”的重要原因：中国还面临着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这同样需要好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支撑。只有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政治学界才能更好地回应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需求。

那么，这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具体意味着什么呢？大致来说，过去旧范式下的政治学研究，很多是围绕三个主题展开的：一是意识形态学，主要是对意识形态的解读；二是政策诠释学，主要是对大政方针的论证和诠释；三是合法性叙事，主要是跟主流体制合法性有关的研究。此外，学界还有不少既不合政治哲学规范、又不合实证研究规范的“理论研究”。^②

研究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要把政治学研究纳入严格的学术规范之中。我曾对目前的政治学研究做过一个粗略的分类，涉及到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意识形态倾向，即研究者是预设意识形态立场，还是秉承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原则；第二个标准是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既可以是政治哲学的学术规范，又可以是政治科学的学术规范。借助两个维度的区分，可以把相关研究归入四种不同类型，即（1）预设意识形态立场、不符合学术规范；（2）预设意识形态立场、符合学术规范；（3）价值中立、不符合学术规范；（4）价值中立、符合学术规范。当然，这里的第二种类型是否存在可能会存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可以推断的是，未来国内政治学的主要成果将来自第四类研究，即价值中立、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只有这一研究领域，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贡献和知识创造。

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该做什么呢？一流学术期刊的主要使命是促进学术创新和知识进步。在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经历范式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可以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严格遵循学术规范，改变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以政治学的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论文为例，符合规范的学术论文几乎都是按照一个模式展开的，即：（1）研究的问题是什么？（2）学界已有何种先行研究（文献综述）？（3）作者的理论假说或主要论点是什么？（4）这一假说或论点基于何种逻辑或因果机制？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都已开设不同程度的研究方法课程，包括质性研究课程和量化研究课程。

^② 我的三位同事曾撰文讨论这一现象，参见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1期。

(5) 作者提供了何种经验证据来论证上述假说或论点？这里通常有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路径。(6) 研究结论是什么？在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下，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几乎都是这样的结构呈现的。^①（当然，很多一流学术期刊也会刊发一些评述性学术论文，其体例不受此限。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文，行文方式也与实证研究论文不同。）总的来说，如果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能够立足于学术规范，改变学术论文的评价标准，就能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范式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从选题方向说，学术期刊能否加强对实证研究论文的支持力度？从目前学术会议的情况来看，符合学术规范的政治科学或实证研究论文比重在提高。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在基于严格的政治科学范式做研究、写论文。如果学术期刊能加强对这类学者和选题方向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在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新旧转换做贡献。

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务实地说，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学术论文的优劣标准。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学领域在未来二三十年将完成一次研究范式的转型，那么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一定是功不可没。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期待同时感谢学术期刊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范式转型做更多的贡献。

[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张洪彬）

^① 关于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应该如何写作，学术文献有很多。参见彭玉：《“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